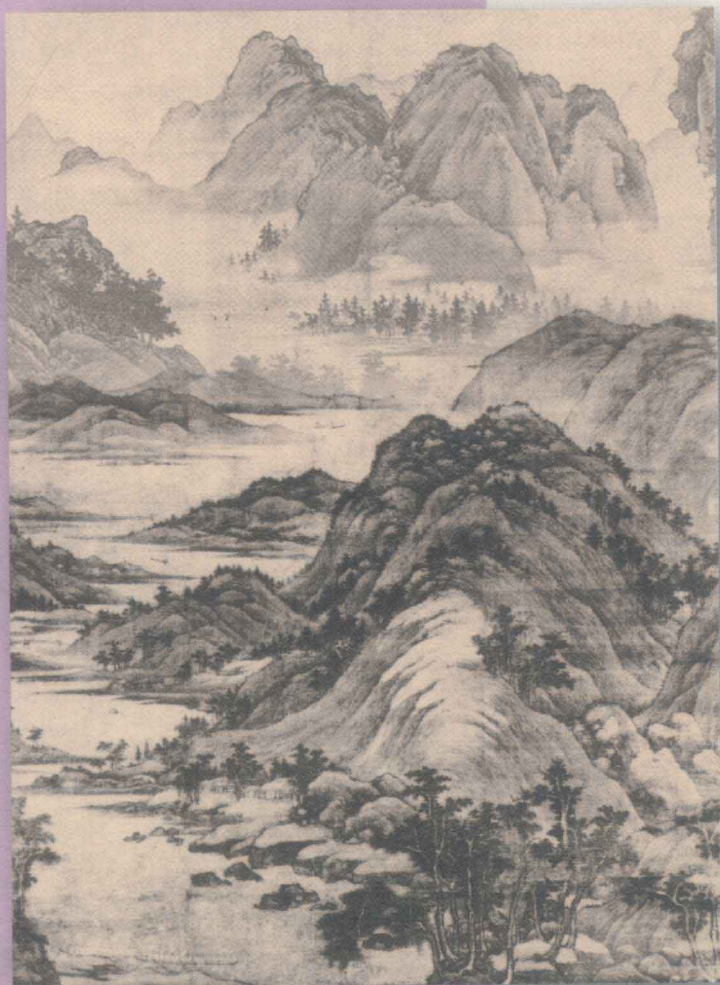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

陳水雲 著



國學叢刊

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

陳水雲 著

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 / 陳水雲著. --初版.

--高雄市：麗文文化，2007.08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78-957-748-295-2 (平裝)

1. 清代詞 2. 詞史 3. 詞論

820.9307

96014811

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

初版 2007/08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380元

著者：陳水雲
發行人：楊曉華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出版者：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F之2
電話：(07) 2265267・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郵撥：41423894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集英樓2F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裝訂：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7) 6165206
發行：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

ISBN 978-957-748-295-2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mail.liwen.com.tw

目 錄

自序 I

緒言 1

- 一、舊詞學的「集大成」及其危機 1
- 二、新舊轉型過程中的衝突和論爭 6
- 三、建構新詞學的「嘗試」及其詞學史意義 10
- 四、二十世紀清詞研究的分期及其意義 18

第一章 1904 ~ 1918 年的清詞研究 23

- 一、「清末四大家」的影響及反響 23
- 二、《人間詞話》與王國維的清詞研究 27
- 三、1908 ~ 1918 年間的清詞研究 31

第二章 1919 ~ 1929 年的清詞研究 37

- 一、梁啟超的清詞研究 37
- 二、胡適的清詞批評及詞界反響 39
- 三、胡先驕對清詞的評價及其清末詞評論 45
- 四、朱祖謀的《清詞壇點將錄》及清詞名家評論 49
- 五、「新派」與「舊派」格局的基本形成 54
- 六、清初詞和女性詞研究 60

第三章 1930 ~ 1949 年的清詞研究 65

- 一、清詞文獻整理的業績 66

2 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

- 二、清詞的總體評價及代表性觀點 70
- 三、對清詞中興具體表現及其原因的分析 75
- 四、清詞分期的界定及詞風嬗變的研究 79
- 五、清詞流派的宏觀研究與「新」「舊」兩派的學術立場 84
- 六、龍榆生、胡雲翼、宣雨蒼、郭則澐等學者的清詞研究 89
- 七、清詞名家的研究成果 100

第四章 1949～1979 年的清詞研究 119

- 一、大陸地區 1949～1979 年的清詞研究 119
- 二、港台地區 1949～1979 年的清詞研究 126
- 三、日本學者的清詞研究 137

第五章 1980～2000 年的清詞研究綜論 141

- 一、清詞研究引起當代學者的高度重視 141
- 二、清詞研究的全面繁榮及其具體表現 144
- 三、清詞文獻整理的重大成就 149
- 四、清詞特色及清詞中興原因的分析 152
- 五、清詞史的研究與嚴迪昌的《清詞史》 158
- 六、清詞宏觀研究的幾個重要特徵 163
- 七、當代名家清詞研究成就述評 170

第六章 1980～2000 年清初詞的研究 179

- 一、易代之際的詞人研究 179
- 二、王士禎及其他詞人詞派研究 184
- 三、陳維崧和陽羨派研究 189
- 四、朱彝尊和浙西詞派研究 195

第七章 1980 ~ 2000 年納蘭性德詞研究 205

- 一、納蘭性德研究概述 205
- 二、納蘭性德生平及思想研究 209
- 三、納蘭詞題材的類型分析 212
- 四、納蘭詞創作特色的總體研究 218
- 五、納蘭詞「哀感頑豔」詞風形成原因的分析 221
- 六、關於納蘭性德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226

第八章 1980 ~ 2000 年中晚清詞的研究 231

- 一、厲鶚、鄭燮及其他詞人研究 231
- 二、張惠言與常州詞派研究 238
- 三、晚清詞的宏觀研究 245
- 四、龔自珍、蔣春霖、文廷式研究 251
- 五、臨桂詞派及「清末四大詞人」研究 261
- 六、清代女性詞的研究 269

第九章 1980 ~ 2000 年港台及海外的清詞研究 287

- 一、港台及海外清詞研究概述 287
- 二、陳維崧、朱彝尊研究 292
- 三、納蘭性德研究 298
- 四、厲鶚、鄭燮研究 304
- 五、項廷紀、蔣春霖研究 309
- 六、清代女性詞的研究 315
- 七、饒宗頤、葉嘉瑩、林玫儀的清詞研究 321

4 二十世紀清詞研究史

結語 329

一、清詞研究觀念之變化 329

二、由傳統到現代的開拓與綜合 334

三、近二十年來海峽兩岸清詞研究的新動向及前景 341

清詞研究書目（1908～2006） 347

1904 到 1919 年，是中國文學由近代向現代過渡的重要時期，也是中國詞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關鍵時刻。自嘉慶初年以來，晚清詞壇盛行的是「比興寄託」觀念，但是，它逐漸為主「真情」、重「意境」、尚「進化」的新觀念所取代，一度受到常州詞派推崇的「溫柔敦厚」詞風不再受歡迎了，以直抒性情為本色的豪放詞風重新抬頭，曾經由「清末四大家」主盟的晚清詞壇，開始出現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新面孔」。在新時代精神的感召下，他們對常州派的詞學觀念進行了強有力的批評，提出適應時代需要的新主張——「以舊風格含新意境」、「形式宜舊，內容宜新」。但這也不過是對常州派詞學「不適時性」提出的一種糾弊措施，也就是說它們是在適應時代的需要下為舊詞學的發展提出一種新的應變策略，他們的「新」主張並沒有溢出傳統詞學的範疇。真正將中國詞學由傳統推向現代的是胡適，他提出的詞學觀念和倡導的研究方法是對整個詞學傳統的「顛覆」，他是要在打破舊詞學體系基礎上建立一種有現代意義的「新詞學」，研討詞學是對「國故」的整理，亦即進行理論的總結，而不是以之指導創作，這一觀念對二十世紀後八十年的詞學研究產生了深遠而深刻的影響。

一、舊詞學的「集大成」及其危機

1904 年是近代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一年，清末四大家前期領袖——王鵬運這年病逝於揚州，清末四大家後期領袖——朱祖謀於次年（1905）退居滬上，第二年（1906）正式定居蘇州，一個新的詞派也是晚清詞壇的最後一個詞派——「彊村派」在東南地區出現了。

彊村派形成於清末光緒年間，但其淵源實可追溯到清末京師詞壇由王鵬運組織的詩詞唱和。朱祖謀、況周頤、鄭文焯初入詞壇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王鵬運

的影響。光緒四年（1888）況周頤由家鄉臨桂入京師，與半塘（王鵬運）共晨夕，因半塘之囑校讎宋元人詞，漸悟常州詞派「重、拙、大」之旨，受其影響填詞由好為側豔語轉而為白石、美成。光緒二十二年（1896）朱祖謀入京為官，被王鵬運邀入詞社，始悟填詞之道，並專力為詞。自謂：「予素不解倚聲，歲丙申重至京師，王幼遐（鵬運）給事時舉詞社，強邀同作。翁喜獎借後進，於予則繩檢不少貸。」並贈其《四印齋所刻詞》，約其共校吳文英《夢窗四稿》，告之以詞史源流正變之故，「從南宋入手，明以後詞絕不寓目」。¹光緒二十四年（1898）鄭文焯入京參加會試，其時王鵬運正舉咫村詞社，朱祖謀、宋育仁皆在其列，鄭文焯亦被邀入。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京劫掠，朱祖謀、劉福姚避居王鵬運之四印齋。「既困守窮城，乃約為詞課，拈題刻燭，喁於唱酬，日為之無間，一闋成，賞奇攻瑕，談諧間作，若忘其在顛沛兀艱中，而自以為友朋文字之至樂，即世所傳《庚子秋詞》也。」²這一時期，王鵬運顯然是京師詞壇盟主，王鵬運論詞力主常州詞派比興寄託之論，但反對淺白直露，主張求「重、拙、大」之旨，朱祖謀、況周頤既受其親炙，故亦特別重視闡發王氏「重、拙、大」說之要義。「鼎革之還，彊村歸隱吳下，恆往來蘇、滬間，而所與商量詞學者，以夔笙與鐵嶺鄭大鶴（文焯）為最著」，³同時還有寓居海上的馮煦、張仲炘、沈曾植，彊村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作為一個在世紀之初出現的詞派，它在近代詞史上的意義是對傳統詞學做了「集大成」的工作。

在清代，詞派紛呈，取向各異，詞史觀亦迥然有別。清初雲間派主要效法《花間》，推崇「二李」（李白、李煜）；繼起之陽羨派重在師法北宋凌厲豪健之風，標榜蘇、辛；浙西派則著力張揚南宋清雅詞風，力推姜、張；中葉以後代浙派而起的常州派又側重在五代北宋含蓄蘊藉的柔婉風尚，其努力目標是溫庭筠的「深美閎約」。總的說來，他們始終是在南北兩宋之間搖擺，並沒有擺脫復古兩宋的思維定式。直到周濟出，這一理論格局才有新的突破，徹底地打破了長期以來南北兩分的做法，認為南北兩宋各有其利亦各有其弊。他說：

¹ 徐珂：《近詞叢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4228-4229。

² 徐珂：《近詞叢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4227。

³ 龍榆生：〈論常州詞派〉，《同聲月刊》第1卷第10號（1941年9月）。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⁴他為初學者指示了一條入門的路徑，就是由南返北，由有門徑到無門徑，由易到難、由淺入深，亦即「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在他看來，清真是合南北兩宋之長的「集大成者」。其〈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所說「清真集大成者也」尤為值得關注，它表明常州派所努力的目標是要集南北兩宋之大成，從此改變了有清一代詞壇對南北兩宋倚輕倚重的審美偏向。如陳廷焯說：「詞家好分南宋北宋，國初諸老幾至各立門戶。竊謂論詞只宜辨別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風華點染，指為北宋，而以長調之平正迂緩，雅而不豔、豔而不幽者，目為南宋，匪獨重誣北宋，抑且誣南宋也。」⁵故他所擬選之《二十九家詞選》，北宋七家附六家，南宋九家附八家，南北兩宋完全没有高下軒輊之分；而已編選成書的《詞則》只是以「沉鬱」、「正變」為分類標準，分「大雅」、「放歌」、「閒情」、「別調」四集而不以南北兩宋分別高低，這是一種全新的詞史觀和理論思維。

彊村派之詞學導師王鵬運正是遵循著這一思路倚聲填詞，其詞遍歷兩宋大家之門戶，取法碧山、白石、稼軒、夢窗、清真，恰與周濟所云「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若合符契。這一思路也成為「彊村派」詞人所遵循的入門路徑，如鄭文焯入手即愛白石之騷雅，後經過多年的揣摩體會，終悟清真之高妙；況周頤論詞雖以南宋為正宗卻也不廢北宋，認為北宋詞之優長在其善於言情，其評北宋著名詞人周邦彥時說：「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盡。」⁶其弟子趙尊岳在《蕙風詞史》中明確地指出，況周頤創作的特點是冶南北宋於一爐，「舉花間之

⁴ 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尹志騰校《清人選評詞集三種》，齊魯書社1988年版，頁207。

⁵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十，屈興國《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齊魯書社1983年版，頁747。

⁶ 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屈興國《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頁64。

閎麗，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於三者有合焉」。⁷朱祖謀初習詞是由夢窗為人門階陞的，後來由南宋上溯北宋，以蘇東坡之疏濟吳文英之密，調和兩端，最後達到「以蘇濟吳」、「由吳希周」、疏密相間的境界。正如現代詞學家蔡嵩雲所說，「學東坡，取其雄而去其放；學夢窗，取其密而去其晦；遂面目一變，自成一種風格。」⁸最能說明這派詞人「集南北之大成」特點的是鄭文焯，他不僅在創作上冶南北宋於一爐，在理論上更是對柳永、蘇軾、姜夔、吳文英的詞史意義進行了新的估價，主張廣泛地學習南北兩宋之優長。「不求之北宋，無繇見骨氣；不求之南宋數大家，亦患無情韻。」⁹只有廣取博采，才會達到「高澹」、「沉著」、「醇厚」的理想境界。

彊村派做為晚清詞壇的最後一個詞派，也是對清代浙、常兩派理論的綜合和集成。眾所周知，浙派論詞主清空騷雅，常州派論詞主比興寄託，前者重體格，後者重意旨；前者以協律為先，後者以立意為本。「浙、常兩派，至道、咸而交故。同光以後，已融合為一體，各去其短而發揮其長，乃集清詞之大成。王鵬運力追北宋而酷好姜夔，尋跡王、吳而醉心蘇軾，首開宏域。朱祖謀擴而大之，浸成千古未有之局，實為清詞一大結穴。」¹⁰在充分體認兩派理論之利弊基礎上，彊村派力求糾兩派之弊，取兩派之長，本張皋文（常州派）意內言外之旨，參以凌廷堪、戈載（浙派）審音持律之說，而益以發揮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為體，故詞格頗高；以守律為用，故詞法頗嚴。」¹¹雖來自常州派，卻不以常州派自限，而是積極地汲取浙派理論之優長，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見，取精用宏，形成一新的詞派——「彊村派」，從而結束了浙派、常州派在晚清對峙達百年的局面。在這之前，儘管常州派聲譽日隆，浙派卻並未銷聲匿跡，反倒在汲取常州派思想基礎上呈現新的發展勢頭，黃燮清、俞樾、沈曾植便是這一詞派在晚清的重要代表，但自「彊村派」出現後，浙派逐漸融入了這一新的詞派，常州派其他支脈也相繼融入到新興的彊村派。

⁷ 趙尊嶽：《蕙風詞史》，龍榆生編《詞學季刊》第1卷第4號。

⁸ 蔡嵩雲：《柯亭詞話》，《詞話叢編》，頁4914。

⁹ 鄭文焯：《手批石蓮庵刻本樂章集》，台灣廣文書局影印本。

¹⁰ 沈軾劉：《繁霜榭詞劄》，香港《大公報》「藝林」新257期，1987年5月4日。

¹¹ 蔡嵩雲：《柯亭詞話》，《詞話叢編》，頁4908。

現代著名詞學家龍榆生指出，晚清數十年間詞風特盛，「非特為清詞之光榮結局，亦千年來詞學之總結時期也」。¹²誠哉斯言，彊村派將傳統詞學推向頂峰，也預示著清代詞學走向終結，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它所提倡的「柔厚之旨」、要求表達「幽約怨悱」之情已經不能適應新的時代需要了，特別是他們在民國以後多以遜清遺老自居，更表現出他們與新時代新社會的格格不入，他們的詞學觀念和表達的情感也自然會遭到來自詞壇新人的批評。這時批評晚清彊村派的主要力量是南社內部的「革命部」及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他們不滿「彊村派」的是其過尊南宋和奉夢窗為主臬。陳去病說：「光緒一朝，詞家宗尚，咸取南宋，而南宋之中，尤重夢窗。故隸事僻奧，摘詞室塞，有類射覆，無當宏旨。雖使閱者終篇畢覽，亦瞢然莫名其妙。此正玉田所譏質實是也，其於騷雅清空之旨得毋背歟！」¹³這裏所說的崇拜夢窗者，正是指以朱祖謀為代表的彊村派，他們不但致力於夢窗詞的整理、校勘、研究，在創作上對夢窗詞也是頂踵膜拜，在當時學夢窗者最能得其「神髓」者為朱祖謀。陳去病認為朱祖謀等學夢窗者，只在使事、摘詞、協律等方面下功夫，這些都是「無當宏旨」的空言。林庚白亦云：「遜清末葉，詩人詞客，競以雕鏤相標榜，往往辭浮於意。……如是者，雖聲律極精，辭藻至美，又安足貴？」¹⁴對彊村派批評最為激烈的當推柳亞子，在他看來朱祖謀尊奉之《夢窗詞》「如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段」，無足道者。¹⁵還有鄭文焯學白石、玉田亦坐一「澀」字之弊。「往往一句中堆砌無數不相聯絡之字面，究之使人莫測其命意所在，甚有本無命意者。此蓋學白石、玉田，而畫虎不成者也。」¹⁶他們學南宋只求形似而略其神似，創作出來的作品便變成了無性情無個性的「偽體」。歸結起來，就是彊村派創作並無真情實感，只有空洞無內容的形式，已成為脫離生活遠離時代的「獮祭品」。後來，王國維、胡適在批評清末四大家時也說過類似的話，或曰：「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

¹² 龍榆生：《中國韻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頁 154。

¹³ 陳去病：《病倩詞話》，《中國公報》1910 年 1 月 1 日。

¹⁴ 林庚白：《孖樓詩詞話》，《麗白樓遺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頁 899。

¹⁵ 柳亞子：《南社紀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頁 14。

¹⁶ 柳亞子：〈與高天梅書〉，郭長海、金菊貞編《高旭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3 年版，頁 604。

拘泥於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¹⁷或是認為他們的創作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只在套語中求生活，「於是這種文學方式的命運便完結了」。¹⁸這些批評一致表明，彊村派已潛伏著深刻的危機，這一詞派的末日已經到來，舊詞學也走到了它生命的盡頭。

二、新舊轉型過程中的衝突和論爭

經過南社文化更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兩次洗禮，彊村派逐漸地淡出歷史舞台。當時，主盟詞壇的是新時代之文化精英——南社諸子，他們在《國粹學報》、《南社叢刻》、《民權素》上紛紛發表新式詞話；1908年王國維亦在《國粹學報》連續刊出他的新作《人間詞話》，提出「寫境」與「造境」、「理想」與「現實」、「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等一系列新話語，為沉悶、冷寂、保守的晚清詞壇吹進了一股新風。繼之而起的是胡適，他以白話為詞的本體論和以詞為新體詩的文學史觀，在當時文壇產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詞學研究流派——「胡適派」。這一時期，新文化派正呈蓬勃興盛的發展情況，具有文化保守傾向的國粹派和學衡派，也在堅守著「中國文化本位」的文化信念，它們的內部成員之間和兩派文化勢力之間，在古與今、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等問題上展開廣泛而激烈的較量和辯論，從而造成了清末民初詞壇極其熱鬧的論爭格局。

最早的論爭是在南社內部展開的，時間約在1909年前後，論爭的焦點是宗南宋還是宗北宋。近代文學史上出現的南社，總體上說是一個革命的文學團體，但它的成員構成極為複雜，有立場堅定的革命者，有純粹的文人；他們的思想亦有革命與保守的雙重傾向，他們的論詞觀點也是革命性與保守性同時並存，對佔據當時詞界壇坫的常州派——「彊村派」，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有的人對彊村派持批評態度，標榜北宋的自然天成之美；有的人則對彊村派持讚賞態度，推崇南宋的人工雕琢之美。據柳亞子《南社紀略》回憶，1909

¹⁷ 樊志厚：〈人間詞話乙稿序〉，王國維《人間詞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頁357。

¹⁸ 胡適編：《詞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頁297。

年11月13日在蘇州虎丘召開的南社成立會上，南社內部在詩詞宗尚上已有了兩派之分，一派是柳亞子、朱錫梁的宗法蘇、辛派，一派是龐樹柏（槩子）、蔡守（哲夫）的力挺夢窗派。柳亞子敘述自己與龐樹柏、蔡守等的衝突經過時說：「在清末的時候，本來是盛行北宋詩（指同光體詩人）和南宋詞（指清末四大家）的，我卻偏偏要獨持異議。我以為論詩應該宗法三唐，論詞是應當宗法五代和北宋的。人家崇拜南宋的詞，尤其是崇拜吳夢窗，我實在不服氣。我說，講到南宋的詞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論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兒，夢窗七寶樓台，拆下來不成片段，何足道哉！這句話不要緊，卻惹惱了龐槩子和蔡哲夫。槩子是詞學專家，南宋的正統派，哲夫卻夾七夾八地喜歡發表自己的主張，於是他們便和我爭論起來。」¹⁹而以龐樹柏為代表的彊村派追隨者或彊村派的力挺者，大多與朱祖謀是師弟的關係，他們還在朱祖謀的主持下於1915年春日組織過春音詞社，進行過多次詩詞唱和。他們對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多有好評，言辭之中亦每每流露出對晚清四大家的景仰之情，如稱朱祖謀的「有挽瀾移嶽之神力」，「誠能推倒一時豪傑，拓開萬古心胸」。²⁰這樣的觀念當然讓他們無法容忍柳亞子等人對其師朱祖謀推尊南宋主張的「攻擊」和「詆謫」，其當庭抗爭，亦理所當然。

南社內部關於彊村派的論爭實際上是清代詞壇南北宋之爭的延續，在清初康熙年間詞壇就有關於這一方面的論爭，這一情況在清代中葉以後繼續發展著。²¹然而，南北宋之爭不僅是詞派之間的論爭，更重要的是文學觀點的論爭，推崇北宋者多主張真純自然之美，標榜南宋者追求的是人工雕琢之美。柳亞子推崇五代北宋及南宋的李清照、辛棄疾，要求文學真切自然地表現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不滿當時彊村派作者的「裁紅量碧」，主張追攀稼軒的「慷慨悲歌」，是要建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理想——噌吰鏗鞳之聲，在詩詞裏以滿腔的熱情去表現其排滿革命的思想和情緒。他一反過去以婉約為正宗的看法，認為「紫色哇聲都閨位」是變體，只有辛稼軒是真才，其「銅琵琶板」之風是詞界正宗。推崇辛稼軒的還有「南社三巨子」之一的高旭，其《論詞絕句》云：「稼軒

¹⁹ 柳亞子：《南社紀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14。

²⁰ 龐樹柏：《衰碧齋詩詞叢話》，《民國日報》1916年10月1日。

²¹ 參見拙文〈論康熙年間詞壇的南北宋之爭〉，《中國韻文學刊》1998年第2期。

妙筆幾於聖，木落君山不忍看。回首夕陽紅盡處，岳陽樓上望長安。」《虞美人·題辛稼軒詞》亦云：「羞作人間癡女子，綺語閒千紙。此兒氣慨絕沈雄，鐵馬金戈迭過大江東。中興無日腥膻遍，亂世儒生賤。我今同抱古人憂，空倚危樓灑淚看吳鉤。」這裏，他既讚揚了辛棄疾的激昂慷慨，也表達了自己憂國憂民、振興中華的英雄氣慨。而以龐樹柏為代表的彊村派追隨者，對朱祖謀標榜的夢窗詞卻作出了高於一般人的評價：「近來詞人，無不崇夢窗者。平情論之，梅溪輕纖，玉田平俗，草窗板滯，竹屋辭庸，舉無足以及夢窗者，要為上接美成，下開清初諸家無疑也。」²²過去，人們常以一「滯」（或曰「晦」、或曰「澀」）字來指摘夢窗，這也正是柳亞子批評近代學南宋者之一「弊」，但在陳匪石、聞野鶴等宗法南宋者看來，世人以夢窗之病在其「澀」，這是對夢窗詞的誤解。²³「蓋澀由氣滯，夢窗之氣，深入骨裏，瀰滿行間，沉著而不浮，凝聚而不散，深厚而不淺薄，絕無絲毫滯相，淺嘗者或未知之耳。」²⁴「若夢窗則作詞渾厚，遣辭周密，若天孫錦裳，異光耀目，無絲縷俗韻，特學者每以蘊意深邃為憾，於是有以凝滯誚之者矣。要之，皆非其本也。」²⁵在他們看來，張炎說夢窗詞是「七寶樓台，碎拆下來，不成片段」，是極為荒謬的。「詞如人體然，完好無恙，則神采奕奕，使從而肢解焉，則臭腐隨之矣，以其臭腐，遂亦謂人體不善耶！」²⁶尊夢窗與尊稼軒是南社內部革命派和保守派在詞學觀念上的主要分歧。

南社諸子雖有激進和保守兩派，但他們之間的論爭畢竟是舊文化體系下的思想交鋒，當五四運動蓬勃興起時他們都表現出對新文化的隔膜和冷淡，這時真正引領時代潮流的是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派。他們在創作上主張用白話去填詞，在理論上則批評清末詞壇的學夢窗之風。1922年3月3日，胡適發表了一篇題為〈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長篇論文，談到自己對清末至民初（1872~1922）五十年間詞的看法說：「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吳文

²² 姚錫鈞：《潛庵學詞記》，《民國日報》1917年9月21日。

²³ 參見拙文〈論晚清常州詞派尚「澀」〉，《東方叢刊》2005年第4期。

²⁴ 陳匪石：《舊時月色詞譚》，鍾振振輯《宋詞舉》（外三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219。

²⁵ 聞野鶴：《論詞雜記》，《民國日報》1917年10月4日。

²⁶ 同註25。

英)派的毒,很少有價值。故我們不討論了。」這顯然是指朱祖謀領導和彊村派影響下的清末詞壇。後來他在1926年編選的《詞選》裏進一步重申了這一觀點:「近年的詞人多中夢窗之毒,沒有情感,沒有意境,只在套語和古典中討生活。」²⁷此觀點提出之後,得到一大批新文化運動追隨者的回應,也招致以胡先驥為代表的學衡派的不滿。胡先驥在〈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指出:「至於詞人,近五十年中亦多可傳者,除朱祖謀外,多不學夢窗。胡君乃以為『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派的毒,很少有價值的』,何胡君敢於作無據之斷語也!」他通過晚清各家創作的具體分析,一一辯駁胡適是作無據之斷語。如王鵬運的詞,高亢淒厲,有稼軒之豪放而無其粗率,豈可說是「中夢窗毒」者?文廷式的《雲起軒詞》,出入於蘇軾、辛棄疾之間,與王鵬運填詞之途徑大相異趣,更不能說他是「中了夢窗派的毒」!還有鄭文焯的詞,澹遠處似白石(姜夔),沉著處似清真(周邦彥),也不能說他「中了夢窗派的毒」。即使是以學夢窗詞知名的朱祖謀,其《彊村詞》得夢窗詞之長,而無夢窗詞之弊,其風骨之遒上,在清詞中當推為巨擘,「惟耳食者聞其學夢窗,或便謂其中夢窗之毒耳」。最後,他總結說:「總觀清末四十年詩詞,遠邁前代,不惟嘉道時代所不及,且在清初諸名家之上,胡君獨取金(和)、黃(遵憲)二家,誠有張茂先我所不能者矣!」²⁸胡先驥對胡適的批評有其合理之處,但他是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立場上立論的。他認為胡適等新文化派以文學革命相標榜,「立言務求恢詭,抨擊不厭吹求」,所以,他要與學衡派其他同仁以繼往開來、融貫中西為職志,並用文言文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清末詩詞的批評文章,為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搖旗吶喊,還非常自信地說:「自《學衡》雜誌出,而學術界之視聽以正,人文主義(指學衡派的文化立場)與實驗主義(指新文化派的文化立場)分庭抗禮,『五四』以後江河日下之學風至近年乃大有轉變。」²⁹他們與新文化派觀點的對立,不只是詞學思想的對立,更是文化觀念的對立,反映了保守主義和激進勢力不同的文化立場。

無論是南社內部的紛爭,還是學衡派與新文化派的衝突,都說明詞學從傳

²⁷ 胡適編:《詞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頁297。

²⁸ 胡先驥:〈評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學衡》1923年第18期。

²⁹ 胡先驥:〈樸學之精神〉,《國風》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

統向現代的轉型經歷一個艱難而曲折的過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南社諸子和新文化派，特別是柳亞子和胡適的歷史貢獻不容低估。儘管南社內部的南北宋之爭還沒有完全從詞學傳統裏超越出來，但柳亞子「內容宜新，形式宜舊」的觀點，已透露出他們對傳統詞學內容變革的訊息，彊村派倡導「意內言外」是鼓吹溫柔敦厚的詩教，柳亞子等則把舊體詩詞做為鼓吹排滿革命的「工具」。正如胡適所言，柳亞子的論詞觀點有太強烈的現實色彩，然而，文學之優劣不在其能否「濟用」，文學有有所為而為之者，更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無所為而為之之文學，非真無所為也。其所為，文也，美感也。」³⁰柳亞子等在變革的問題上太坐實，只變其內容而未變其形式，他的文學革命是不徹底的。其實內容與形式是一體兩面的，內容「變」則形式亦隨之要「變」，胡適倡導白話文學正是適應了這一文學變革的趨勢，主張在語言層面上突破文學表達不自由的「瓶頸」，讓作者能真正做到言文合一亦即思想表現與語言表達的統一。當然，他們對傳統詞學的「變革」也有其先天性的不足，或是理論的不嚴謹，或是表述的隨意性，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有了來自內部的批評和外部的攻擊，如龐樹柏與柳亞子的辨難，胡先驕對胡適的反駁等等即是。但是，從柳亞子的內容變革到胡適的形式變革，其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它標誌著中國詞學由傳統向現代轉型有了一次質的飛躍。

三、建構新詞學的「嘗試」及其詞學史意義

從 1919 年開始，胡適對詞學問題相繼發表了一些新的觀點。他認為詞實乃唐朝民間的樂調，是宋代的白話文學，「香豔」和「俚俗」為其主要特點，語言上以白話為其當行本色，一部文學史就是「活文學」正在興起與「死文學」走向消亡的歷史，千年詞史的主流是以蘇、辛為代表的直抒性情的豪放詞派。其《詞選》就是這種新思想的具體展現，其《嘗試集》也是這種新思想的試驗品。胡適這些思想挾裹著「五四」運動的風潮，很快地在大江南北迅速流傳開來，雖然它遭到了來自學衡派的批評，也引起其盟友如劉半農、錢玄同、康

³⁰ 曹伯言編：《胡適日記全編》卷十一，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頁 239。